

朱小平◎著

从军统到保密局

1925至1949年国民党特工轶事



它是一个维护蒋家王朝统治的情报组织
它是一支使日伪汉奸闻风丧胆的特务班底
它是一台令无数正义人士蒙难的杀戮机器

它就是军统
它集神秘与恐怖于一身
它的兴盛与没落随着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终结
而被封缄入历史的长河……
这是一段真实的军统兴衰史



从军统到保密局

1925 至 1949 年国民党特工轶事

朱小平 ◎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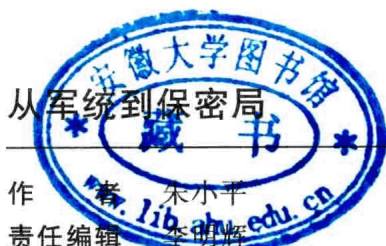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军统到保密局 / 朱小平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151-0453-9

I. ①从… II. ①朱… III. ①军统局-史料
IV. ①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4074 号



作 者 朱小平
责任编辑 李明辉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2 号院东区 14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88637122
传 真 010-88637287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453-9
定 价 36.80 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充满哲理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历史是由史料组成的。史料浩如烟海，历史学家的思想和学识，决定了史料的爬梳、分析、研究、整合，才可以给人们以正确的历史本质和真实，而非不加分析的堆砌。我不是历史学家，但一直对清末至民国的历史兴趣盎然。

比如研究民国史和国民党史，即离不开隐蔽最深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特务如同军事一样，也是政治的延续和手段。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对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的20多年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警政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起到维护专制独裁的“党国”的重大作用。军统毫无疑问在政治层面是蒋介石专制独裁的忠实工具，其本质就是用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其性质就是反共反民主，其手段就是集法西斯之大成。中共隐蔽战线杰出领导人、与军统做过长期斗争的周恩来，早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就对军统等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做过本质的准确分析与批判。诚如周恩来所说：“……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他们用法西斯的手段对待革命志士，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国民党政权延续了2000多年封建制度的一些特征，同时也延续了唐、明、清直至袁世凯、北洋政府重视特务机构以稳定其统治的做法。其罪恶、残暴的特点更是集封建社会和纳粹德国、美国等特务组织之大成。

因而，研究民国史、国民党史，亦离不开其特务组织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就是专制、黑暗、残暴的罪恶史。

近些年来，对民国史、北洋政府、国民党史的研究有所拓展，但对国民党史和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研究却差强人意。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统组织（包括汪伪特工组织）的档案，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或销毁、或移存台湾，至今没有完全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出版了不少描述国民党特务组织和领导人的“传记”“纪实”，甚至“揭秘”“演义”类书籍；近年更有不少有关影视作品问世，虚实难以分辨，戏说多于事实，泥沙混淆，完全不可看做是信史。大陆和台湾两地还出版了不少原军统、中统骨干的回忆录，这些固然填补史料之不足，但亦存在着掩盖罪恶、文过饰非、史实错误、前后矛盾的瑕疵。我个人认为，如果不能核对档案撰写，仅凭记忆、好恶，必然出现失误，尤其口述史料更要谨慎引用，应该与文献史料互为对证与鉴别。大陆出版的一些特务头目的出版物，因其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后已成为战犯，除在世者亲撰外，逝后整理出版者故实则为“交代材料”，唐纵、沈醉等遗留的日记，尚可有一定参考价值。

还有，军统、中统因其性质——其定性当然不容粉饰——应当是被历史所否定的。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军统等组织被国民党作为一种非常方式用以抵御日寇的侵略，才使这一本身维护独裁的秘密组织投身于抗战的烈火硝烟之中。因之对其的评价更充满了复杂性。

2005年8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讲话中曾特别指出：“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军队与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与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据说，在同年10月台湾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赞成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观点，即国共合作赢得了抗战胜利。

那么，“隐蔽斗争”无疑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情报组织对日寇的浴血斗争，这一点愈来愈得到认同。当然，夸大或不谈或贬低“隐蔽斗争”在抗战中的作用都不符合历史。不过，军统的抗战丝毫没有改变它一贯反共的性质。

过去谈军统、保密局的书籍，有演义成分居多者，而且对一些其领导人如戴笠私生活过多渲染，甚至无限捕风捉影，给人造成认识混乱，有些本末倒置。只侧重军统暗杀的种种“揭秘”，也不乏真假莫辨。如中共领导人王若飞、叶挺、邓发等“四八”飞机失事，目前史料没有确证是军统所为。四川大学著名的费巩教授失踪案，尽管当时社会舆论怀疑是特务所为，但并没有确证。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尽管有军统特务参加，但并不是军统局发出的命令，而是云南地方警特人员的行为。又如当年轰动一时的施剑翘行刺孙传芳案，也有坊间文字传说是戴笠提供帮助。经我考证完全是讹传。凡此种种的推论形成文字，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诚如沈醉先生所说，就连军统档案“也不是可信的”，“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工夫才能推断出来”。加上军统、保密局、中统作为特务组织的隐秘性，更是不易发掘。

史料。我曾读过一张政法单位办的报纸，整版刊载一位曾是“锄奸团”成员后参加军统的刑满释放者的专访，绝口不提“锄奸团”后来成为军统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又为军统、保密局卖命的事实，将自己美化成抗日志士。“抗日锄奸团”固然是热血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团体，但后来毕竟成为军统外围组织，受军统领导，也被军统、保密局利用于反共，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无须隐讳。

另外，军统、中统一些骨干在解放战争中被俘成为战犯，他们所写的交代材料，并非全部是信史，一是记忆有误，另外有些事实也并未如实写出。沈醉与徐远举在军统监狱曾审讯过中共地下党员江姐，行刑过程只谈了钉竹签，并未谈要扒光江姐的衣服以迫使其就范。这还只是细枝末节，沈醉、先大启（中统省调查室主任）在改造期间，从未写过江青、张春桥与特务组织的关系及被捕的经历，在粉碎“四人帮”后，才写成材料公布。即便是多年在军统工作的将级特务，如沈醉、文强、章微寒等，所写回忆也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这就需要细致研究取证，以免以讹传讹。另外，关于叛徒特务的情况，沈醉先生有所顾虑，也很少提及。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写有关隐蔽战线与军统斗争的电影剧本，始接触有关公开出版的军统史料，后来又与军统老人沈醉等相识，并对其进行过采访，还有过写沈醉传记的积累。因沈醉先生女儿沈美娟大姐出版了《我的父亲沈醉》，我才放弃这一题材。1990年，我与友人合著的《蒋氏家族全传》出版，有关军统、中统的章节由我撰写。因为军统早期学习过中共特科（“特务”这一称谓实际上还是中共首先使用的，1927年5月，为应对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军委成立“特务工作处”，以保卫自身安全与特殊的军事行动工作。国民党本身特务组织称之为“调查机构”）和苏联政治保卫的组织方法，后又仿效德国纳粹特工组织，故由此上溯，也研究了有关“契卡”（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后改为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格伯乌”(苏军总参情报局,克格勃前身)、德国“盖世太保”(帝国保安处)及党卫军的史实。复兴社和军统确曾向上述机构学习过,康泽还仿效党卫军建立了“别动队”,军统的交警总队也确有党卫军的痕迹。近年不断发现的或台湾方面公布的有关史料也在我浏览、研究之列,当然必须加以甄别。

军统与“契卡”“格伯乌”“盖世太保”以及美国情报机关是不同的,后三者在国内没有像中共那样有组织对手。军统在某些方面如电讯侦破技术等还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与中共较量期间,军统还一直担负着与日寇侵略者的斗争,是上述情报组织所不可比拟的。在这本书中,我不惜篇章突出中共隐蔽战线与军统的较量,这是过去一些有关军统的书籍未谈及或很少反映的。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艺术、中共地下人员坚贞的革命信仰、超强的政治素质,就连军统、中统也不得不恐惧并佩服。

另一方面,军统不仅仅是一个特工组织,还担负着经济秩序管控的任务,尤其在抗战期间,军统趋于公开化,在缉私、经济管制、交通检查、税务、海关、邮检、航空及对日伪的经济战等方面,全面负责管制,虽然军统参与了抗战,但使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得到巩固。本书特辟专章予以介绍,使之可以窥见军统的另一面。另外,对军统在抗战中的锄奸、策反、肃奸及军统渗透军队、警政和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等方面所起到维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作用,也作了系统的揭露。对从军统到保密局的机构沿革、保密措施乃至称谓等细节,亦有专章叙述。我觉得“军统内外的称谓”可以提供给影视剧编导作为参考,免得其胡编乱造。因为在此之前,我没有发现有关的研究者肯下工夫对此加以钩沉。

同时,针对加入军统、中统的中共叛徒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本书也有系统叙述,也许对今天仍有警示作用。这也是以前有关书籍中少见的。

军统作为蒋介石最残暴的反共工具，其罪行必须要秉笔直书。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贪污腐化是它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也是它失去民心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军统作为国民党政权统治的主要支柱之一，也毫无例外受到腐蚀。军统由于有种种特权，从上至下贪污受贿、腐化享乐成风，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国民党政权的其他部门，而并非如军统所标榜的“革命团体”“清白家风”等说辞。过去一些有关军统的书籍多揭露戴笠的腐化享乐，其实军统的中高级领导人甚至一般特务，都存在敛财腐化、钩心斗角的歪风邪气，本书也辟有专章予以揭露。

对于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作者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更没有添枝加叶。对于一些所谓“秘闻”，如无信史资证，概不采用。对于一些所谓“谜团”，则尽量利用新发现的有关史料加以丰富，如戴笠坠机之谜，直到今天也仍悬而未解。我的一些个人心得或可抛砖引玉，供专家和读者参考。

本书不是研究专著，因而力求言简意赅，避免冗长，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舛误之处。说其是一本民国史普及读物，似乎更恰如其分。

也许，读者掩卷仍然会问及：除了上述，还有何目的？我想引用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创始人周恩来当年对沈醉的一番话来说明。

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醉等特赦人员，希望沈醉“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将“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育的作用”。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

(沈醉：《军统内幕·前言》)。我写这本小书，可以说基本遵循了周恩来在 50 多年前的这番话。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其实并没有过时，似乎也可以成为写作此书的宗旨。另外，戴笠坠机摔死后，周恩来曾说过：戴笠不死，中国革命的进程还要推迟四五年。由此可见，戴笠及其领导的军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危险、最凶恶、最残暴的敌人。据民政部 2009 年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28 年浴血斗争中，英勇牺牲在战场和刑场的英烈多达 2000 多万人，仅有 176 万人记录在各级人民政府编辑的《烈士英名录》中。其中有多少英烈被军统枪杀、暗杀，至今也没有准确的记录。周恩来的“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何其沉痛之言！

鲁迅先生说得好：“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当年不可一世的军统、保密局、中统在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但是历史绝不能忘记和淡化，革命前辈的鲜血不能白流。读史可以知兴替，中国的前途必然会更加开放、富强、昌盛、民主，作为中国人也应该知道往昔，珍惜现在，憧憬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刘小晖女士将近一年的约稿催促，没有她的执着，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更要感谢吴志实先生对本书的关心和支持。还要感谢友人靳扬对此书的录入、清改、照片遴选等繁琐工作所付出的大量劳动。

朱小平

2013 年 3 月 9 日初稿于北京顺义

2014 年 3 月 25 日定稿

目 录

写在前面	1
楔 子	1
第一章 党务系统里的调查科	3
第二章 徐恩曾靠顾顺章案起家	7
第三章 徐恩曾失宠内幕	14
第四章 复兴社与军统	20
第五章 戴笠和军统的膨胀	26
第六章 蒋介石的驾驭术	30
第七章 用暗杀手段排斥异己	38
第八章 残暴与罪恶	47
第九章 腐化敛财与钩心斗角	55
第十章 纵横捭阖	63
第十一章 在抗战中坚持反共	69
第十二章 与日本间谍的博弈	76
第十三章 大锄奸	82
第十四章 境外追杀汪精卫	93
第十五章 斩首行动	105
第十六章 大策反	109
第十七章 军统在战时的经济管制	119
第十八章 中美合作所	128

第十九章 美国各方对中美合作所的争夺	139
第二十章 大肃奸	145
第二十一章 利用叛徒	150
第二十二章 为军统卖命的张国焘	156
第二十三章 叛徒特务的下场	162
第二十四章 蒋、戴之间的斗法	171
第二十五章 戴笠之死	180
第二十六章 军统、保密局的机构	193
第二十七章 渗透军队	197
第二十八章 从忠义救国军到交警总队	202
第二十九章 保密措施知多少	207
第三十章 军统内外的称谓	213
第三十一章 中共与军统的较量	218
第三十二章 残阳夕照	229
第三十三章 海岛余音	235
第三十四章 “十三太保”和“十人团”的结局	242
主要人物简表 (至 1949 年)	254
主要参考书目	257



1990 年，本书作者在沈醉先生家中采访

楔 子

中国以往的封建时代，不少皇帝特别重视特务及其机构的作用，例如唐代武则天重用的周兴、来俊臣之流，明代令人谈虎色变的厂卫，清朝雍正皇帝的“粘杆处”等等，史不绝书。袁世凯也有自己的特务组织，一时杀人如麻，屡兴大案。到了民国时期，为了巩固统治和排除异己，蒋介石更加注重建立和强化庞大的特务组织，诸如复兴社、蓝衣社、中统、军统等等。这些特务组织和他的统治相辅一生，起到了其他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而且在他统一中国掌握国家权力前，就已经开始培植自己的特务小系统。

蒋介石在年轻时就干过暗杀工作，因为他在上海入过青帮，于绑票暗杀之类多有心得。当时震惊朝野的暗杀陶成章一案，就是蒋介石的亲手杰作（国民党官方史料一直讳莫如深，但野史证信却是不可涂

改，见徐铸成先生《旧闻杂忆》）。后来蒋介石主政黄埔军校期间，一直在有意培植特务打小报告，特别是在黄埔学生中，广为发展特务网。例如，后来成为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警察总署署长的唐纵，在黄埔六期学习期间，就经常秘密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不仅同学中他认为有问题的言行或对蒋介石不满的议论，他要向蒋介石汇报；就连教官中他认为有问题的言行，也要向蒋介石汇报。特别是共产党学生和国民党中的左派学生，更是他格外监视的对象。唐纵的告密行为很诡秘，很多人一直没有发现，因此有不少共产党学生受到他的暗算。他因之也受到蒋介石的喜欢和信任，这使他以后得以飞黄腾达。唐纵何以这样做，就因为他看透了蒋介石的心理。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由此可见蒋介石在还没有完全取得和掌握政权时，就已经非常注意特务工作和培养特务骨干了。



第一章

党务系统里的调查科

蒋介石很早就注意建立特务组织，而且特别重视选择特务头目，从来都是将特务组织交给最亲信的人把持。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和黄埔军校校长，于1925年年底，把从美国回到上海的陈立夫召到广州，安排他做了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的机要秘书，从此陈立夫一直参与机密。蒋介石总司令部有个机要科，则完全是做特务工作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机要科划归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专以特务活动为任务的调查科，陈立夫即出任调查科首任科长。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许多政府机关成立特别党部，党员证均注明“特字第×号”，其中虽有调查科人员，但并非特务组织。“文革”中红卫兵组织查出特别党部人员，往往以为是中统特务，其实不是，犯了常识性错误。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组织部也有党务调查科，其任务只不过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档案资料，间或做一般性的社会政治调查，谈不上搞什么特务活动，所以蒋介石认为这个组织起不到他所希望的特殊作用。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之兄陈果夫担任了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担任了调查科科长，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蒋介石规定调查科的任务，是调查国民党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和搜集共产党及其他异己组织的情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查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清共”浪潮下，国

民党的“清共”整党组织和军警机关一时手足无措，是调查科积极配合提供共产党组织状况及党员的情报和名册，致使大批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捕遇难。在这方面，调查科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组织部门和政府民政部门统计：1927年四一二政变到1932年这一期间，有100万以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而其中在调查科直接策划下的牺牲者更不是一个小数目。

蒋介石看到了调查科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愈来愈重视这个特务组织，并对它予以特殊的偏爱。蒋介石一贯认为有两个法宝最能维护自己的江山，一是军队，二就是特务组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就是靠特务活动和特务组织起家的。

在调查科成立初期，蒋介石还没有一统天下，政权并不稳固，财政状况也相当困难。黄埔军校的某届学员班都曾受到遣散，但对于调查科他却不惜血本，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从各个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首先，从任命陈立夫任调查科科长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蒋介石与陈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因为陈立夫是浙江人（蒋介石很看重同乡关系），更因为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在民国初年曾任沪军都督，蒋介石是陈其美的老部下；同时与陈立夫之兄陈果夫在上海交易所是老搭档。有了这层关系，蒋陈两家关系极为亲近。陈立夫称呼蒋介石为“蒋三伯伯”。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其留学费用常常由蒋介石供给。所以陈立夫留学归来，蒋介石立即倚为心腹，并委以重任。蒋介石赞其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风纪的人物”（《读者》2011年第21期20页）。调查科科长虽由陈立夫亲自担任，但任期不长。陈立夫以后高升替蒋介石看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等职，但他非常明白蒋介石的意图，对调查科乃至后来的中统局抓得非常之紧，每届领导都必须由他和陈果夫选定，才报蒋介石批准。

在蒋、陈的灌输下，调查科不仅是特务组织，也是个政治组织。因为蒋介石一直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这是由陈果夫

首先提倡而获得蒋介石大加欣赏的)。陈立夫更加以极大发挥，他认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陈立夫是受过大学教育后来又留洋受到过所谓美式民主教育的知识分子，却甘心情愿做特务工作并阐发出一套有浓厚法西斯色彩的政治理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其实，不光中统后来的领导人如张道藩、徐恩曾等是留洋的知识分子，乃至军统组织的不少头面人物，也多为表面文质彬彬的书生人物，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也许，蒋介石虽然出身青帮，但他也明白喊杀喊打的杀手并不能成大事。

所以，蒋介石把中统交给陈立夫，可以说这着棋并没有错。陈立夫一开始就把中统抹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

陈立夫给中统下的定义是：特务组织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特务活动是为了保护党、国家、领袖的安全，它与党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神圣的事业；只有最优秀的（国民党）党员才有资格做特务工作，等等。其实核心定义就是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起初，调查科的宗旨应该是调查国民党党员或派系的有关情报，但蒋介石一直大声疾呼：只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不彻底消灭共产党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思想被陈立夫心领神会，因此他一直把消灭共产党组织作为调查科的首要任务。陈立夫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欣赏还在于：陈立夫并不主张只靠残酷镇压和屠杀的手段（虽然他并不反对使用暴力），他认为这样做并不能彻底根除共产党的存在；他最主张的是破坏共产党的首脑组织和基层组织，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从整体上消灭共产党。这一思想体系也成为调查科及后来的中统特务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1928年，尽管蒋介石在人力、物力上都有困难，还是特准从他亲任校长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让调查科挑选了张国栋等10个被认为是最忠实可靠效忠“总裁”的人到调查科担任骨干，这10人以后成为调查科的高级干部。1930年，蒋介石再次批准调查科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黄埔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王思诚等20人；这20人被蒋介石认为是忠诚可靠和精明强干的骨干分子，他们加入调查科，的确使调查科如